

論 点 摘 編

在新的起点上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陈家刚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制度就是这个“法度”的重要内容。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局,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积累了新的重要经验,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的历史起点上,统筹“两个大局”,中国共产党需要加强自身建设,尤其需要增强依规治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继续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发挥好党内法规在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障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用。

一级学科视域下纪检监察学体系论

张震等在《新文科教育研究》2022年第2期撰文指出,纪检监察一级学科的体系建构应当重点把握其历史演进、学科属性和基本范畴。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纪检监察在党的建立初期、巩固执政地位、坚持自我革命、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这五个阶段中演绎其实践逻辑,每个阶段所蕴含的纪检监察思维经过凝练和升华后最终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纪检监察学科。从学科属性上讲,纪检监察学是法学门类之下的一门以实践为导向、研究范式多元、兼具政治与法学双重属性的新型学科。从基本范畴角度出发,纪检监察的概念范畴更加突出纪检与监察的实质融合,理论范畴表现出对国家

监察权内涵和功能的革新性拓展,实践范畴体现为破解监察权“单兵作战”的实践困局。围绕上述基本问题,纪检监察学科的下一步建设应当聚焦专属学科体系的构建、专门学科制度的建设,以及专业人才队伍的打造。

区分原则:区分什么?

王轶在《东方法学》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我国民法典就基于合同行为的物权变动认可区分原则,以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基础,明确区分合同行为效力发生的条件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发生的条件,其第215条属于区分原则的典型法律体现。债权形式主义与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实现区分原则的法律技术。以两种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都能得出第215条所表达的结论,这也是在解释论上围绕区分原则区分什么问题出现争议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以及第641条第1款而言,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和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并完成法律的构成。区别之处在于:在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之下,相同的法律条文会得出不同的法律解释结论,会呈现不同的法律构成,这就是物权变动模式立法选择的体系效应。需要指出的是,从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历史解释等角度观察,民法典第352条但书的规定并未被赋予贯彻区分原则,以解决房屋交易中已交付但未登记的房屋所有权归属的使命。因此,不宜解释为属于民法典第209条第1款但书的法律体现,第352条也并非区分原则的法律体现。

回到美学,重启美育

刘成纪在《中国文艺评论》2022年第7期撰文指出,1930年,蔡元培在为商务印书馆《教育大辞书》

撰写的“美育”词条中,对何谓美育有一个基本定位,即“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今天看来,这种解释可能是粗糙的,但却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美育是美学理论的实践形态,没有美学理论作为先导和规约的美育,必然是盲目的美育。那么,当代中国美学到底能够给予美育什么?一是美学理论自身的非稳定性,为借助美育洞穿日益严苛的自然人文科学壁垒提供了可能,并为专业化的知识学习提供了难得的“美学时间”;二是美学理论价值生发的多元性,为当代美育实践展开了多元向度,它使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均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三是对中国美育传统的重新发现,开启了自由、秩序与和谐三者并举的美育目标。以此为背景,一种既遵循美学理论的一般性,又兼顾古今通例、中西互鉴的当代中国美育框架也就呈现出来了。

从资本主义的幸存到现代性的阴影王国

刘怀玉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撰文指出,《空间的生产》是一部试图回答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之问“资本主义何以幸存”并展开全面现代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杰作。其核心论题是:资本主义因为把原有的直接物质生产方式升级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或空间的生产而得以苟延残喘,但亦因其固有矛盾进一步激化为空间的矛盾而必然灭亡。此书之重心不是后现代式三元空间辩证法,而是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升华的空间矛盾辩证法。但其解决问题之道并非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案,却是“近尼采式”的集“国家-社会-文明”为一体的现代性三维批判推想。其中既有晚期马克思主义倾向,也有后马克思主义成分,是一份有争议的遗产。研究通过阐明列斐伏尔现代性批判的“三位一体”,以期摆脱目前学界对《空间的生产》的“后现代式”片面诠释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式”简化解读这两大主流模式的过度依赖,恢复空间生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来面目与意义。

“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的进展、挑战与应对

安晓明在《区域经济评论》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源。“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合作正逢其时。近年来,数字经济逐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点合作领域,数字经济合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协调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领域合作进展迅速,数字服务贸易迅速发展,“丝路电商”合作成果丰硕,各种远程服务迅速发展,新型金融支付方式不断出现。但仍然面临来自合作基础、合作机制、合作动能、合作环境的四重挑战,具体而言,包括数字经济鸿沟、网络安全威胁、战略互信不足、规则制定欠缺、金融支持乏力、无序竞争等。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将持续,全球政治经济局势依然复杂严峻,要积极面对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挑战,还需不断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加强政治磋商和政策沟通,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共同守护网络安全,完善金融支持体系,加强协调统筹,构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共同体。

《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

席格在《中州学刊》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从书写是“人”“地”关系建构的重要方式看,《洛阳伽蓝记》可谓杨衒之抒发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所促成的“恋地书写”的审美结晶。北魏洛阳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塑造正统而营建的都城,与杨衒之所秉持的华夏正统价值观念和以都城为核心的天下观念内在契合,从而赢得他的深度认同。因此,杨衒之在洛阳为官生活期间,在都城空间对他产生情感激发和他主动感知洛阳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洛阳形成了深挚的情感关联。当北魏灭亡后杨衒之重返故都遍览洛阳丘墟时,这种情感关联跃升为“恋地情结”。在抒发“恋地情结”和载录故都辉煌历史意识的共同促使下,杨衒之采用“记”体与“合本子注”体例相结合的书写形式,将人文地理性书写、情感书写与生存经验书写等有机融入《洛阳伽蓝记》中。《洛阳伽蓝记》通过全景式再现北魏洛阳,保存了都城规建、佛教传播、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等足以补证史书的珍贵史料,同时自身也因诗情、赋笔与史识的结合而成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展现出多元敞开的价值。

北宋魏处约家族墓志文研究

淮建利在《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2期撰文指

出,民国以来出土于洛阳的6方魏处约家族墓志不见于传世文献。墓志文反映了北宋魏处约家族自后梁至北宋哲宗时期177年的赓续历史。自魏处约起,该家族成员连续三代与宗室联姻,形成“姑舅表亲”“亲上加亲”的婚姻特点。北宋时期这种“勋旧之门”与宗族“迭为婚姻”的现象文献虽有记载,但实例却极其罕见,故而可补史阙。该家族成员因与宗族联姻得以荫补为官,这一方面巩固提高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又使家族成员的仕途受到限制,这是宋朝荫补制度精心设计的结果。宋代宗室婚姻法律制度、宗女荫补特权、封建礼制等制度设计使得魏处约家族虽无显宦却可以世代食禄、赓续连绵。这种稳定的、世代相传的官僚与宗族联姻的家族结构,是宋朝统治制度的衍生物,具有很强的寄生性,也是宋王朝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

国家治理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改革领导力的运行逻辑

李忠汉在《领导科学》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改革领导力是在党领导国家治理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北京市党建引领下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中的“吹哨报到”机制为切口,以“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为视角,总结相关解释和经验可以发现,改革领导力具有特定的运行逻辑:以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对象,以政策主导制度变迁为实现路径,以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和处理社会矛盾为目标,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为效果。这一运行逻辑的独特性和有效性,使改革领导力作用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并将显著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新时代,为更好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改革领导力及其运行逻辑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呈现出领导体制上从“党政分开”到更强调“政党统合”、驱动机制上从“压力问责”到“问题制导”、制度取向上从“碎片应对”到“整体应对”、实现路径上从“分散实验”到“法治主义”、能力取向上从“单中心治理”到“合作共治”的演变特征。

科学稳健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路径研究

张占仓在《改革与战略》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巨大压力,我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向全球作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实现“双碳”目标的战略部署,全国各地均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部分领域和地区已取得较好成效。但是,我国仍然需要科学分析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必然性。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全面部署,我国要集中力量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积极发展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等绿色能源,高质量建设清洁煤电供应体系,科学推进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有序做强绿色交通,联合创新绿色低碳应用技术,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深化能源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绿色低碳转型政策体系,科学稳健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为我国顺利打通实现“双碳”目标之路作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性贡献。

人性:一个沉没的问题

何怀宏等在《争鸣》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人性”在现代西方思想学术中似乎已成为一个日渐沉没的问题,究其因,一是源自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二是因政治立场而被排斥。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考虑将人性的探讨首先作为一个对事实的研究,在这方面,一些新兴自然科学的基础和交叉学科可以给我们带来新知,对人性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因此而多样化。对于后者,西方阻止人性探讨的关键障碍目前看来还是因政治立场而设置的学术禁区。无论如何,尊重事实和讨论自由是思想学术发展的必备条件。中国的人性研究需要尊重和吸取传统智慧和西方近代人性研究的睿见,但也不必固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完全可以在新的知识背景和基础上,努力推进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乃至达成一些新的综合。

西方治理范式的诞生:背景、理论与制度

臧豪杰在《兵团党校学报》2022年第3期撰文指

出,现代治理的提出源于国家社会领域遭遇的深刻变革:经济社会日益复杂化、国家统治危机和自组织网络的兴起。新自由主义是现代治理的理论基础。但是,现代治理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取向和权利取向抱有疑虑,市场与社会之间并非是完全契合的关系,权利取向面临着消解人际责任、信任的可能。因此,治理企图建构出容纳“国家—社会—市场”的三元平等架构和在价值领域同时容纳善与权利。在政治制度层面,治理扩大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基础,超越了对民主的程序化理解。但是,自由主义民主与治理之间存在着悖论:自由主义民主未必带来治理,治理的好的国家未必是自由主义民主制。自由主义民主的特殊性、治理与民主的悖反、治理的专业性与民主的大众性都反映了二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乡村文化转型发展中的价值重构

李涛在《学习论坛》2022年第7期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推动了乡村文化的历史转型。当前,传统乡村文化核心价值理念的解释力、指引力不足,文化价值认同不够,乡村文化自信缺失。重构乡村文化核心价值,必须坚持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紧密结合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变革需求,推动人生追求从积累财富向创造价值转变、生活意义从过好日子向创造美好生活转变,使乡村居民人生意义建构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乡村社会相协调;推动讲仁爱从小我情感向公共意识拓展、行忠恕从基于个人人情向国家信仰和法律规则转变、尚和合从基于无争向包容逐利竞争转化、守诚信从道德要求向责任信仰提升,实现优秀传统乡村文化核心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校园欺凌治理的社会工作介入:赋能模式与循证实践

魏雷东等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撰文指出,校园欺凌问题不是简单随机个体之间的行为冲突,而是复杂特殊人境互动关系失衡的后果。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助

人方法介入校园欺凌治理,将个人与环境互动作用作为分析重点,使得校园欺凌治理从注重“学生行为”的问题检视转向“成长环境”的生态赋能,体现的是“优势视角”对“问题视角”的理念超越、“赋能模式”对“教育模式”的迭代升维。校园欺凌治理的社会工作介入要结合国际化“循证实践”来探寻本土化的赋能模式,实现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的思维转换、从训导模式到赋能模式的范式转型、从循证实践到最佳实践的标准转化。具体来看,要对“零欺凌家庭”进行情感赋能,关注代际情感互动;对“无欺凌校园”进行认知赋能,落实学校的责任;对“反欺凌政府”进行意志赋能,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对“去欺凌社会”进行行动赋能,拓展公众的参与渠道。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经济赋能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李国英在《现代化农业》2022年第6期撰文指出,数字经济具有天然的渗透性、融合性和赋能性,将通过新的生产力要素——数据,从生产管理、溯源体系、智慧物流、供应链金融、品牌和营销渠道等环节全面赋能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重组产业组织系统,升级产业链条,提高农业产业的能级和效率。数字化的前提是规模化,通过规模化做大做强优农业主导产业是县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在县域内布局产业,有利于在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高产业和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通过这种高集中度密集型的产业链条带动县域的发展,而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则为这种产业链条的延伸和增值提供了便利条件。农业农村全方位数字化所带来的新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则更加突显“差异化”“服务化”新逻辑,一方面打通供需连接渠道,打造快速、高效、精准的农业产销生态系统,重塑农业与消费者之间双向互动关系;另一方面,供应链由消费端向生产端与消费端“双轮驱动”挺进,以“工业思维+数字农业”指导农产品研发与生产制造,形成营销、物流、技术、资金、人员培养等全方位数字化赋能,进而实现数字农业价值链的升级与再造。